

公民法律意识的量表测量：一个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

秦 华 任大鹏

摘 要 法律意识是关于社会与法律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法律意识的标准化的量表测量技术一直未受到重视，我国学术界最近涌现的大量关于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在调查方法上的欠缺。本文借鉴环境意识测量研究的经验，利用所收集的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数据对建立法律意识量表体系进行了尝试，其结果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文章同时提出了法律意识量表体系设计的基本框架，并简要论述了该测量方法对今后研究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法律社会学 法律意识 环境意识 调查研究 量表框架

作者秦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博士候选人；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教授。

一、引 言

法律意识是关于社会与法律之间关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其着重于分析人们对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法律的主观体验和理解。这一研究主要起源于美国和欧洲，然后迅速地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最近的几十年里，我国法律社会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法律意识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表达方式和研究角度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把法律意识理解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是社会主体关于法律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和。根据目前学界关于法律意识概念和结构的界定，法律意识的基本构成部分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的法律知识水平，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对社会成员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看法，对自我法律行为的态度以及法律需求五个方面。^① 随着我国现代化法治进程向

前推进，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现象的思考日益深化，并开展了大量的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这些实证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法治化建设的重要观点和相关政策建议，但普遍在法律意识测量方法上存在不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人类社会心理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环境意识在很多层面都与法律意识存在着相似之处。环境意识的测量问题一直是关于环境意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法律意识测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借鉴环境意识测量的经验和启示，从而为今后的法律意识测量提出一个探索性的量表框架。文章首先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法律意识

* 河北省丰宁县黑山嘴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和当地参加法律意识问卷调查的农村居民对我们实地调查的顺利进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配合，重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何川协助完成了中文参考文献的收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 关于法律意识概念和结构的详细的研究综述，参见秦华：《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对河北省丰宁县黑山嘴镇农民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中国农业大学 2003 年硕士论文。

和环境意识的测量研究进行了总结性的评述,然后利用笔者收集的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数据对设计一个标准性的法律意识量表的可行性进行了试验性分

析,最后讨论了法律意识量表设计中的实际问题,以及该测量方法对于今后研究发展和政策制定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意识的测量及环境意识测量的启示

关于法律意识的调查和分析是法律意识研究的两个主要研究趋向之一(另一个为法律意识的描述性的人种志研究)。^②虽然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研究相对缺乏对个体内心关于法律的映象和意义的深度理解,它却具有能够更高效地反映一定社会群体法律思想的整体特征和趋向的优点。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又被称为关于“法律的知识 and 评价 (Knowledge and Opinion about Law)”的研究。^③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律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④萨拉特 (Sarat) 对这一时期关于美国公众对于警察、律师、法庭、公民自由、社会控制、及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态度的社会调查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评论。^⑤早期的法律意识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主体关于法律的知识 and 态度,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多项选择题或判断正误题进行问卷调查,然后运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虽然在调查中采用的许多问题(如关于法律态度的选择题和关于法律知识的判断题)都可以用于建立复合的刻度工具 (Composite Scales),但只有极少数的研究采用了这种统计技术。^⑥米亚萨瓦 (Miyazawa) 曾在法律社会学的权威期刊《法律和社会评论》(Law & Society Review) 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日本法律意识研究的综合性评述,他指出了已有研究在测量方法上

的缺陷,并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意识测量量表。^⑦然而,在这之后的法律意识研究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出现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文也是对米亚萨瓦关于建立法律意识量度工具的观点的回应。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对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农民法律意识)的社会调查研究。^⑧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影响性的看法和观点。然而在法律意识的测量方面,目前的研究显示出几点不足。首先,已有的关于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大都缺乏对测量工具的信度 (Reliability) 和效度 (Validity) 的必要检验,这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度提出了一定的疑问;其次,与国外有关法律意识研究相似的是,目前的国内的调查研究主要是运用基础的描述性方法(如频数和百分比)对数据进行分析,而没有建立复合的法律意识刻度变量以用于进一步的双变量或多变量的统计分析,这就使得在对法律意识本身以及其与其他变量(如年龄、性别、职业等社会经济特征、法律行为、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不够深入;最后,不同的研究在内容上虽有一定的重合,但主要是针对于法律意识的不同方面(法律知识、法律态度或法律行

② S. Silbey, "After Legal Consciousness", 1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05), pp.323—368.

③ M. Hertogh, "A 'European' Concep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Rediscovering Eugen Ehrlich", 31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4), pp.457—481.

④ D. Engel, "How Does Law Matter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in B. Garth and A. Sarat (ed.) *How Does Law Matter? Fundamental Issues in Law and Societ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09—144.

⑤ A. Sarat, "Studying American Legal Culture: An Assessment of Survey Evidence", 11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77), pp.427—488.

⑥ 例如: J. Clark and E. P. Wenninger, "The Attitude of Juveniles toward the Legal Institution", 55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64), pp.482—489; J. Gibson and G. Caldeira, "The Legal Culture of Europe", 30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96), pp.56—85.

⑦ S. Miyazawa, "Taking Kawashima Seriously: A Review of Japanese Research on Japanese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Disputing Behavior", 21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87), pp.220—241.

⑧ 例如郑永流、马协华、高其才、刘茂林:《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董瑶典:《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基本构造及提高途径——以北京为中心的调查》,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任大鹏:《我国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3期;沙红、施建良:《关于杭州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思考》,载《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史清华、陈凯:《现阶段农民法律素质与法律意识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为)进行调查,设问的形式也很多样,这些都使得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法律意识调查的结果缺乏可比性,从而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综合和积累。

由于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基本属性上的共通性,关于环境意识的测量研究对法律意识的测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环境污染和恶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公众环境意识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和经济学等学者的研究兴趣,对于环境意识的测量研究也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条主线。环境意识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两类常用的量表体系。一种是多维度的“环境知识—态度—行为量表(Environmental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Scale)”。该量表体系起源于马洛内(Maloney)和他的同事设计的测量环境态度和知识的刻度,^⑨它随后得到了大量应用和发展,波埃伦(Bohelen)等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多尺度环境意识测量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关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对环境的态度、及环境行为倾向。^⑩环境意识测量的另一个主要量表体系是敦拉普(Dunlap)和范·李尔(Van Liere)提出的一般被认为是单维度

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⑪该量表后来又做了相应的改进。^⑫这两种类型的量表都被广泛地用于关于环境意识测量的实证分析中,无论使用哪一种量表体系,环境意识测量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从发展初期就注意运用心理测量学的方法来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并建立复合的环境意识变量用于相关的统计分析。在最近十年里,公众环境意识的测量成为了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研究是围绕着“新环境范式量表”在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中的应用。洪大用等提出美国的“新环境范式量表”在经过一些适当的本土化修订后,可以作为测量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工具,^⑬学者们同时也分析了个体环境意识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例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和居住地)的相互联系。^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有的研究已证明了“新环境范式量表”的可用性,但该量表实质上是测量的环境关心的概念,而环境关心从内涵来说应是小于环境意识。因此,该刻度用于测量环境意识的有效性还值得商榷。

三、建构法律意识量表体系的试验

从以上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虽然法律意识和环境意识同是人类社会心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二者的测量研究却处于极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环境意识的测量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而法律意识的科学量度尚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环境意识研究中系统的量表测量方

法对法律意识的调查与测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为今后法律意识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大有前途的新课题。在探讨建构一个标准性的法律意识量表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该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作者在本文中利用2003年初在河北省丰宁县黑山嘴镇获得的农民法律意识问卷调查数据对设计法律意识

^⑨ M. P. Maloney and M. P. Ward, "Ecology: Let's Hear from the People", 28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pp.583—586; M. P. Maloney, M. P. Ward, and G. N. Brought, "A Revised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30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5), pp.787—790.

^⑩ G. M. Bohelen, B. B. Schlegelmilch, and A. Diamantopoulos, "Measuring Ecological Concern: A Multi-Construct Perspective", 9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993), pp.415—430.

^⑪ R. E. Dunlap and K. D. Van Liere, "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A Proposed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9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78), pp.10—19。虽然 Dunlap 等认为新环境范式量表是一个单维度的刻度,也有其他学者发现该量表实际上包含了多个维度(例如: D. Scott and F. K. Willi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 Pennsylvania Survey", 26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4), pp.239—260.

^⑫ R. E. Dunlap, K. D. Van Liere, A. G. Mertig, and R. E. Jones, "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A Revised NEP Scale", 56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0), pp.425—442.

^⑬ 洪大用:《环境关心的测量: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载《社会》2006年第5期;肖晨阳、洪大用:《环境关心量表(NEP)在中国应用的再分析》,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⑭ 参见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量表进行了尝试性的统计分析。虽然该数据中的一些内容与现在的农村实际已不一致(如交纳定购粮),但其对于本文的法律意识测量的方法论分析仍然是适用的。

这项社会调查主要选择在黑山嘴镇的平山、窄岭、厢黄旗、黑山嘴四个村进行,共发放问卷190份,回收有效问卷165份。调查对象的性别组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等基本情况统计如下:男97人(59%),女68人(41%);18—30岁22人(13%),31—40岁90人(55%),41—50岁40人(24%),51—60岁8人(5%),60岁以上5人(3%);初识字9人(5%),小学49人(30%),初中74人(45%),高中30人(18%),大专及以上3人(2%);种养殖业91人(55%),非农务工23人(14%),商业手工业24人(15%),农村干部21人(12%),其他6人(4%)。总体看来,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约为3:2,年龄相对集中在18—50岁之间,65%的调查对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主要职业相对分散,较多的人从事种养殖业。根据《丰宁满族自治县2001年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来看,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分布基本合理,大致能代表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状况,由他们得到的各项调查数据应是基本可信的。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6个部分:(1)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2)农民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

法(对法律的评价);(3)农民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4)农民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行为态度;(5)农民的法律需求;(6)被调查者个人基本信息。^⑮为了在问卷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法律意识的测量刻度,作者对适合的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并根据一些问题生成了新的变量。所有最后用于分析的变量的取值都转换到了一个从1(低/不正确)到3(高/正确)的3点分段尺度上,数值越大意味着法律意识的水平越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详见表1。

作者这里首先运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对经过转换所得的法律意识测量刻度的内在信度进行检验。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部分涉及到了对《宪法》和《农业法》的了解、知道的法律的数量以及对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的了解等五个问题。检验中使用了SPSS软件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工具中的“如果删除项目后的刻度(Scale if Item Deleted)”选项对问题进行筛选,每一轮将删除后对于提高整体alpha值最多的项目去除,直到删除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再提高alpha系数为止。通过这种方法,“知道的法律数量”变量被从法律知识水平测量刻度中去除,剩余的四个变量合在一起的alpha系数为0.60,基本达到了可以接受的内在信度标准,^⑯这四个变量的数值最后被加总形成了法律知识水平刻度,它可能的取值在4到12之间。

表1 主要变量的新旧取值和频数分布^⑰

变 量	新 值		
	1 (低/不正确)	2 (中)	3 (高/正确)
法律知识水平			
了解《宪法》	完全不了解 (27) ^⑱	了解一些或不太了解 (123)	了解 (15)
了解《农业法》	完全不了解 (20)	了解一些或不太了解 (132)	了解 (13)
知道的法律数量	0个 (52)	1—4个 (75)	5个及以上 (38)
对村民自治的了解	不知道是什么 (16)	认识不清(第2或3项)(61)	回答正确 (第1项) (88)
对村民委员会的了解	不知道该组织 (11)	认识不清(第1,2或4项)(120)	回答正确 (第3项) (34)
对法律的评价			

^⑮ 调查问卷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前注1附录。

^⑯ 关于最低的alpha系数标准研究文献中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但一般认为系数在0.6或0.7以上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⑰ 问卷数据中变量的缺失值一律用其平均值代替。

^⑱ 这里“完全不了解”为问卷中与新值“1(低)”相对应的原值,括号里为新值的频数,其它部分同此。

与法律的关系	无关 (7)	有点关系 (18)	有很大关系 (140)
法律公正	不公正/说不清/ (19)	大致公正的 (23)	公正的 (123)
人情大于国法	同意 (26)	不能肯定,看情况而定(44)	不同意 (95)
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政策高于法律/说不清楚(36)	两者差不多 (33)	两者有很大区别 (96)
法律的作用	不重要/说不清 (23)	比较重要 (40)	非常重要 (102)
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			
强占欠债方的黄牛抵债	合法/说不清楚 (13)	有道理但不合法 (57)	不合法 (95)
丈夫在家打骂妻子	合法/说不清楚 (5)	有道理但不合法 (5)	不合法 (155)
家长不准出嫁的女儿继承财产	合法/说不清楚 (29)	有道理但不合法 (26)	不合法 (110)
男女未办理登记手续而结婚	合法/说不清楚 (7)	有道理但不合法 (8)	不合法 (150)
近亲结婚	合法/说不清楚 (12)	有道理但不合法 (4)	不合法 (149)
村干部和民警拘留未按时交纳定购粮的农民并强行挖走粮食	合法/说不清楚 (26)	有道理但不合法 (28)	不合法 (111)
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行为态度			
发生经济纠纷	老人/私下解决 (23)	找村干部解决 (85)	打官司 (57)
通过“私了”解决纠纷	同意 (25)	不能肯定,看情况 (93)	不同意 (47)
发现家属有犯罪嫌疑	不劝/说不清 (19)	可能劝 (46)	坚决劝 (100)
权利受到侵害时起诉的想法	不怎么想/说不清 (15)	有时想 (56)	立即想 (94)
买到假冒商品,商店却不承认	算了 (16)	向有关部门投诉 (135)	向法院起诉 (14)
抓住偷水果的人	痛打解恨/赔钱 (38)	交给村干部 (63)	送派出所 (64)
法律需求			
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数量	1—2个 (64)	3—4个 (52)	5个及以上 (49)
与多少法律工作人员有过接触	0个 (56)	1—2个 (79)	3个及以上 (30)

对法律的评价部分包括被调查人对自身与法律的关系、法律公正、“人情大于国法”的说法、法律与政策间的关系及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态度。分析中同样使用了“如果删除项目后的刻度”的筛选方法,这使得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看法这个变量被去除,剩余的四个变量生成的 alpha 系数为 0.50,接近于一般要求的 alpha 值标准。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部分让被调查人对一些具体现象的合法性进行判断,通过同样的问题筛选过程后“家长不准出嫁的女儿继承财产”项目被去除,剩下的五个变量生成的 alpha 系数为 0.42。相比看来,对权利义务关系看法的测量刻度的信度系数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成刻度的项目数量较少和这些变量的生成方式的原因。作者在原来的问卷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建立法律意识量表,这些

项目是经过对原问卷中的问题的相应转换以应用于生成测量刻度的试验。另外,被调查群体在对权利义务关系看法的项目上取值的较高的同质性(参见表1)也很可能降低了最后得到的 alpha 系数值。^⑨考虑到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以及以上这些因素,作者认为这个结果仍然是适当的。被调查人在这九个变量上的数值被加总而分别形成了对法律的评价刻度和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刻度,它们各自可能的取值分别在4到12和5到15之间。

在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行为态度上,部分询问了被调查人在一系列假设的情形下可能采取的法律或非法律的行为。经过筛选,“没有问题”被从该测量刻度中去除,所有的六个变量生成的 alpha 系数是0.50,与通常可接受的信度标准非常接近。这

^⑨ R. A. Bernardi, “Validating Research Results When Cronbach’s Alpha is below .70: A Methodological Procedure”, 54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4), pp. 766—775.

六个变量的取值被汇总形成了法律行为态度刻度,其可能的数值范围在 6 到 18 之间。最后,由于原来的问卷中并没有问题能够直接被用于构建法律需求刻度,所以作者根据判断将相关的问题进行重新赋值生成了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和与法律工作人员的接触这两个新的变量。由这两个项目生成的 alpha 系数为 0.60,基本达到了要求的信度标准。这两个变量的取值也被汇总形成了法律需求刻度,其可能的数值范围在 2 到 6 之间。表 2 总结了所生成的五个法律意识刻度的基本信息,从这些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调查样本在法律意识的各个主要方面的整体水平,这些变量也可以用于对问卷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之中。例如,原来的调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分析农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对其法律意识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五个新的法律意识变量来检测不同的农民职业群体在法律意识各个

维度上所存在的差异,并对这些差异的显著性进行相应的变异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检验。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虽然从事不同职业农民的平均法律意识水平存在着不同之处(种养殖业农民在法律意识的各维度上都相对处于或接近于最低水平),但除了在法律评价刻度上的差异呈现了接近于 0.05 的显著水平外,其它的四个法律意识变量上的差异都不显著,此后的 Tukey 检验也未发现各农民职业群体互相间在这些变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同时,我们可以利用新生成的刻度变量来分析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等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运用多重协方差分析(Multiple Analysis of Covariance)来控制这些基本变量对于农民法律意识关系与所从事职业间关系的影响。^②

表 2 法律意识刻度基本信息表

刻 度	包含的项目数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实际数值范围	ALPHA 值
法律知识刻度	4	8.5	1.4	4—12	0.60
法律评价刻度	4	10.3	1.7	5—12	0.50
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刻度	5	13.6	1.6	7—15	0.42
法律行为态度刻度	6	13.5	2.1	6—18	0.50
法律需求刻度	2	3.8	1.3	2—6	0.60

表 3 各农民职业群体的法律意识比较

变量(平均值)	种养殖业	农村干部	非农务工	商业手工业	F 值	p 值
法律知识刻度	8.3	9.0	8.6	8.6	1.75	0.159
法律评价刻度	10.1	11.1	10.7	10.1	2.53	0.059
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刻度	13.5	13.6	14.0	13.9	1.08	0.359
法律行为态度刻度	13.4	13.2	13.5	13.8	0.27	0.847
法律需求刻度	3.7	4.0	3.7	4.0	0.71	0.547

另外,作者也尝试了将所有的 24 个变量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综合的法律意识刻度。依照同样的问题筛选过程,没有任何项目被去除,全部变量生成的 alpha 系数为 0.70,达到了所有生成刻度的信度系数的最高值。虽然这并不能简单地做为建立一

个单纬度的法律意识测量量表的依据,但其证明了法律意识各个组成部分整体的高度相关性。同时,通过加总各变量取值而形成的五个法律意识刻度变量之间也显示了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些都体现了所建立的法律意识刻度的测量效度,因而也从另一个

② 这里简要讨论农民法律意识与职业的关系,旨在说明由量表测量所产生的符合法律意识变量在数据分析中的具体应用,对于统计分析结果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此未纳入文中。

角度为建构法律意识量表的科学性提供了支持。

在初步检验了法律意识刻度试验的信度和效度后，有必要对法律意识的维度（Dimensionality）进行探索性的分析。作者采用了 SPSS 软件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工具对全部的 24 个变量进行分析，因素抽取和转轴方式分别选择的是主要成分法（Principle Component）和最大方差法（Varimax）。为了提高所抽取的因素结构的可理解性，那些在多个因子上显示出较高负载的变量被逐个地从模型中

去除，直到最后结果中不存在交叉负载的变量为止。通过这个选择步骤，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看法、对家长不准出嫁的女儿继承财产和近亲结婚现象的合法性的评价、发生经济纠纷时偏向的解决方式以及对通过“私了”解决纠纷行为的态度这五个变量被从分析中去除。对剩下的 19 个变量的因子分析产生了五个因素，各变量在这些因素上的负载见下表（表 4）。

表 4 变量在抽取的因素上的负载表

变量	因素负载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了解《宪法》			0.822		
了解《农业法》			0.890		
知道的法律数量	0.643				
对村民自治的了解	0.570				
对村民委员会的了解	0.487				
与法律的关系		0.640			
法律公正		0.357			
人情大于国法		0.517			
法律的作用		0.555			
强占欠债方的黄牛抵债					0.715
丈夫在家打骂妻子					0.520
男女未登记而同居		0.580			0.182
村干部和民警拘留未按时交纳定购粮的农民，并强行挖走粮食					0.741
发现家属有犯罪嫌疑				0.578	
权利受到侵害时起诉的想法				0.321	
买到假冒商品商店却不承认				0.781	
抓住偷水果的人				0.628	
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数量	0.566				
与多少法律工作人员有过接触	0.650				
特征值	2.074	1.934	1.853	1.804	1.510
解释的变异百分比	10.916	10.181	9.755	9.496	7.949

由于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里进行因子分析的重点不是考察从数据中所提取的单个的因素，而是观察其显示出的整体的维度结构。从表 2 可以看出，数据分析的结果体现了一个多维度的模式。虽然抽取出的因素与已建立的五个法律意识刻度并

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但属于特定法律意识刻度的变量倾向于在相同的因素上具有较高的负载。另外，无论是在未转轴前还是在转轴后，每一个抽取的因子所解释的数据中的总变异的比率都基本差别不大，不存在一个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要素，这也

反映了法律意识的多维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针对法律意识的各基本构成部分设计一组测量刻度应

该较建立一个单一的总的法律意识刻度更为适当。

四、法律意识量表体系的设计

从前一部分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作者原有的调查问题并没有按照建构心理测量量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设计,经过转换后获得的变量仍然体现了建立法律意识量表体系的可行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严格按照测量刻度设计程序而建立的法律意识量表应该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由于篇幅有限,作者这里仅对法律意识量表体系的基本设计框架和重点步骤进行一些探讨。

如前所述,法律意识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思想系统,它主要由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权利义务关系的判断、法律行为态度及法律需求五部分组成。因此,全面地测量公民的法律意识应当设计分别的刻度来涵盖法律意识的各个维度,这个多维的法律意识量表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知识刻度:测量被调查人对一些主要法律问题的了解程度的主观映象,每一个项目可用一个5点的分段尺度(1=“完全不了解”,5=“完全了解”)来进行测量。具体的项目内容可以是与被调查人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是有关的法律办事程序。项目的数量可根据实际调查情况设定(例如在10—15个左右)。

(二) 法律评价刻度:测量被调查人对于法律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一般看法。具体的测量方式为列举出一系列关于法律制度的陈述,这些陈述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每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无论他或她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或“法律只是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制定的”),每一项目可用一个5点的Likert刻度(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来进行回答。项目的数量可根据具体情况设定,在通过加总各项目答案取值创建该刻度时,应首先确保对各项回答的取向要保持一致(例如从1到5数值越高表示对法律的评价越高),如有不一致的项目应首先对其答案进行反向的重新编码。

(三) 对权利义务关系看法的刻度:测量被调查人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态度。具体方式为列举出一系列法律现象或行为,要求被调查人用一个5点的分段尺度(1=“完全不支持”,5=“完全支持”或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来表示其对该现象或行为的态度。问题项目可以围绕一些与被调查群体相关的典型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设计(例如“甲公司在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原材料购买合同,一年后该原材料的价格急剧下降,甲公司经理决定单方面终止合同”)。在建立该刻度时,同样要考虑答案取向的一致性问题。

(四) 处理权利义务问题态度的刻度:测量社会主体对自己法律行为的态度,该刻度一般由一系列假定情形下的法律行为组成(例如:“当你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会考虑起诉吗?”)。项目的答案可根据设问的方式设计相应的一个5点的分段尺度(例如1=“从不”,5=“总是这样”;或1=“完全不可能”,5=“完全可能”)。

(五) 法律需求刻度:测量被调查人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以及对应有法律的态度,各个项目可以用一个5点的分段尺度(1=“完全不需要”,5=“完全需要”)来进行测量。具体的项目内容可以是一系列主要的生活和工作领域(例如经济合同、职业权益保护等)的法律培训或立法要求。

以上提出的只是法律意识量表体系的一个一般框架,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应根据研究目的、被调查群体特征、研究条件等实际情况对各项刻度的具体项目进行设计。在设计量表的过程中,应参考目前心理测量文献中已确立的基本程序。^②总的说来,一个科学的量表的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研究者应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广泛系统地综述以明确法律意识的内涵,然后在已有研究的

② 具体参见 R. F. DeVellis,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参见中译本: [美] 罗伯特·德威利斯:《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魏勇刚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基础上并结合深度访谈、中心小组讨论等定性的信息收集方法来建造一个大的备选问题库，以用于生成测量法律意识各个组成部分的刻度。其次，研究者确定各项目回答的测量格式，制定量表的初步样本，并根据法律意识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以最大程度地提升量表工具的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下一步，量表样本需要在一部分抽

样选取的研究主体上进行测试，并根据结果对量表所包括的各个项目进行调整和改进。最后，优化后的量表被应用于实际研究之中，在对属于各个法律意识刻度的项目的维度、信度和测验效度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检验后，研究者加总或平均被调查人在这些项目上的答案值以获得最终的复合刻度变量。

五、结 语

本文分析了目前法律意识测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借鉴环境意识研究领域的测量方法对改进今后的法律意识调查研究进行了探讨。作者利用已收集的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数据尝试建立一个大致的法律意识量表体系，对于该量表的初步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为建构科学的法律意识测量工具提供了概念和实证两方面的基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的法律意识量表框架，这项研究方法的发展需要大量实际研究的检验和改进，以及广大法律意识研究者间的讨论和交流。此外，对于法律意识的测量应该是使用多维度的刻度组合还是单维度的总括性的量表，这个问题本身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建构一个系统的量表体系对法律意识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和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标准化的法律意识量表能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间法律意识的横向比较，以及不同时间段公众法

律意识的纵向比较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关于法律意识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整合；其次，这项测量技术能够推进当前关于法律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和分析层次，由该测量工具所产生的复合法律意识刻度既可以作为因变量来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法律意识的影响，也可以作为自变量来分析法律意识对法律行为及其它相关的社会心理或行为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法律意识的科学测量能够促进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对于社会与法律关系的交叉研究。另外，经过实质性综合的法律意识实证研究成果能为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有效的参考和支持，对于法律意识的多维度的理解和测量也有利于形成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责任编辑：余履雪）